

四

针对当下散文写作的弊端,孙犁先生曾经给予尖锐的批评。他先从中国散文传统入手,在《散文的虚与实》一文中明确指出:“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,是避虚就实,情理兼备。”

中国古代散文,孙犁先生推崇欧阳修。在《欧阳修的散文》一文中,他说:“文章的真正工力,在于写实;写实的独到之处,在于层次明晰,合理展开;在于情景交融,人地相当;在于处处自然,不伤造作。”

在这篇文章中,他还说:“古代散文,很少是悬空设想,随意出之的。当然,在某一篇文章中,作者可因事立志,发挥自己的见解,但究竟有所依据,不尚空谈。因此,古代散文,多是有内容的,有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的。”

强调的还是写实。重视的是古典散文,从中汲取营养,他说:“中国古代散文,并没有成为古玩。”

在这样的基点上,他指陈当下散文写作存在的问题:“近来的散文,多变成了‘散文诗’,或‘散文小说’。内容脱离实际,多作

夜起,地板上有一黑甲虫,优游不去,灯下视之,忽有诗意。——1983年6月23日题于《文苑英华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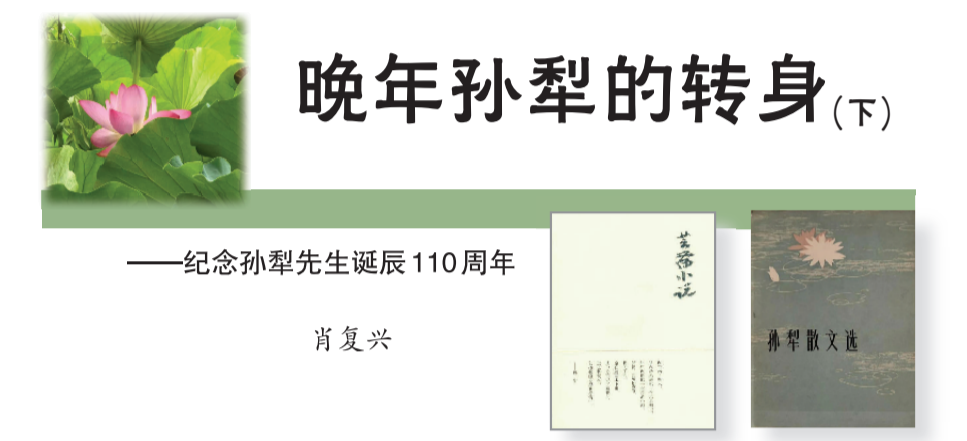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四日下午,余午睡,有人留窗夹门缝而去,亦聊斋之小狐也。

是日晚七点三十五分,余读此书年谱,忽门响如有人推扉者,持眼镜出视,乃知为地震。——1975年2月4日题于《蒲松龄集》上

这三则非常有意思,前两则,一台上观鸟,一灯下看虫。观鸟,先觉其美,后见鸟被射伤而慨叹“外界有弹弓”,多有象外之意。看虫,孙犁先生说是“忽有诗意”,其实,夜半看虫,虫与人均优游不去,更有衰年独处的落寞之凉意,让人读后心动而感喟。

后一则,留窗和小狐,门响与地震,交织一起,虚实相加,有声有色,均在《聊斋》氛围和情境中。如果不是正在读《蒲松龄集》,哪里来此水乳交融的妙笔横生?却是如此巧合,恰逢其时,碰撞一起,溅起回声。

日后,孙犁先生曾说:“散文之作,一触即发。真情实感,是构思不出来的。”果不其然!一触即发之际的散文,是写作的最佳状态,可遇而不可得,亦在别的文学样式中难得一见。我觉得,这有点儿像诗里的即兴绝句,如同李白



晚年孙犁的转身(下)

——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

肖复兴

者主观幻想之言。”他指出,这是缘于“对中国散文传统,无知或少知,偏离或远离。其主要表现为避实而就虚,所表现的情和理,都很浅薄,且多重雷同。常常给人以虚假,恍惚,装腔作态的感觉。而这些弱点,正是散文创作的大敌大忌”。

可以说,这样的“大敌大忌”,在如今的散文写作中,依然存在,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。

孙犁先生晚年的散文,百世不忘耕稼业,一壶时叙里闲情,写故里乡亲乡情,占有相当比重。他写的一组《乡里旧闻》,其中有一篇《菜虎》。很短,千余字,可分为三部分:

一,写卖菜的农民菜虎,手推一辆独轮车,因是木制的轮子,车子发出吱扭吱扭的声响,悠扬悦耳。他的老伴儿,坐在家,车子离家还有八里地远呢,就能听见菜虎推车的声音,下炕做饭,菜虎到家,饭也煮熟了。在这里,孙犁加了一笔,写道:“在黄昏炊烟四起的时候,人们一听到这声音,就说:‘菜虎回来了。’”

二,民国六年七月,滹沱河发大水,庄稼全都被淹。菜虎的小女儿盼儿只好挖野菜充饥。小孩子不懂事,问她:“你爹叫菜虎,你们家还没有菜吃?还挖野菜?”盼儿说“一家人都快饿死了”,后,孩子们“一下子就感到确实饿了,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,不说话了”。

三,菜虎不得已,把盼儿送进了洋教堂,“立时换上了洋布衣裳,也不愁饿死了”。但是,盼儿被带到了天津,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。菜虎和他多病的老伴儿,后来还是死了。

最后,孙犁写道:“现在农村已经看不到菜虎用的那种小车,当然也就听不到它那特有的悠扬悦耳的声音了。现在的手推车都换成了胶皮轱辘,推动起来,是没有多少声音的。”

如同一首简洁的奏鸣曲,三段式,一个简短的尾声。三段式:一喜,一悲,一更悲。尾声:将故事延伸到现在,胶皮轱辘新车,和独木轮旧车呼应,在有声和无声的对比中,戛然而止。

所有这一切,都是中国传统散文的写法,即孙犁先生自己所说的:“中国散文写作的主要点,是避虚就实,情理兼备。”在这里,实是基础,情才会由此抒发,理才会自然而然地如水溢出。而这里的实,是实实在在的,同时也是极有节制的,如棱角分明的木刻,绝不恣肆淋漓的泼墨大写意。

孙犁先生以自己的创作实践,一以贯之,针对散文写作的“大敌大忌”,践行着这样中国式散文写作的理念。

五

《书衣文录》,是晚年孙犁先生写作散文与随笔别样的范式。其中大多是随笔,但也有部分是散文笔法,完全可以当作散文来读。这样的散文,记取了富有生活意味的点点滴滴,虽只是涉笔成趣,却如新蔬出泥带露,别具另一种风味。

试举这样三则——

昨晚台上坐,闹树上鸟声甚美。起而觅之,仰望甚久。引来儿童,遂踊跃以弹弓射之。鸟不知远引,中两弹落地,伤头及腹,乃一虎皮鸚哥,甚可惜。此必人家所养逸出者,只嫌窥中天地小,不知外界有弹弓。

——1975年6月13日题于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

乘舟将欲行,忽闻岸上踏歌声。这样的散文写作,在《书衣文录》中独见,是秉承传统笔记写法一脉,却连带现实,绝不掉书袋或泛滥抒情,绝不拖泥带水,可谓“书衣体”,属于孙犁先生散文创作中独具风格的文体一种。

六

1988年,孙犁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散文《菜花》。

他写白菜花,说是冬天储存的大白菜,放久了,菜头会鼓胀起来,乡间称之为“菜怀胎”,菜花就是这样从菜头上冒出来的。这种菜花,群芳谱中不见,寻常人家常见,非常普通。

在这篇散文的结尾,孙犁先生由菜花引申,特意写了这样一段话:

人的一生,无疑是个大题目。有不少人,竭尽全力,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。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,一篇像菜头菜花一样的散文。

这一段话,最能彰显孙犁先生关于散文写作的主张,也最能看出孙犁先生散文写作的风格。

有志于散文写作者,可以从品味并学习到一些东西,便是别只钟情什么宏伟的大文章,别瞧不起像菜花一样小小不然而的小文章。散文写作,从来不以长短或大小论英雄。所谓:斧头虽小,却能砍断大树。

孙犁先生这一菜花小文章的想法,在日后的散文写作中越发明确彰显,我以为源自这样两点:

一是对散文的基本理解与认知。他曾经说过:“中国散文的特点,是组织要求严密,形体要求短小,思想要求集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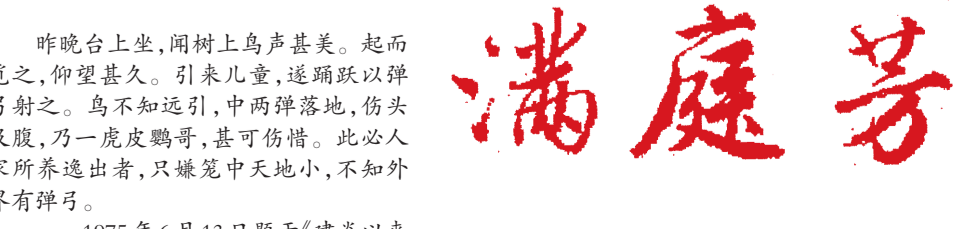
二是和他后来一再提出的“老年散文”理念密切相关。他说“老年人宜于写些散文”;他说散文“是一种老年人的文体”……这样的论点,他不止一次说过。而且,他特别指出:“人越到晚年,他的文字越趋简朴,这不只与文学修养有关,也与把握现实,洞察世情有关。”

可以看出,如菜花一样小而简朴的散文,是孙犁先生晚年对这一文体的认知与把握,并实践于他的写作之中。

1995年,孙犁先生病重而封笔之前,写下最后一篇散文《记秀容》。这篇散文最是他这样菜花体散文的代表。与写作《菜花》一文,相隔7年,他写得更是删繁就简,简朴,简洁,简约。

这一篇散文,短短只有千字,记述的只是秀容从17岁到64岁人生轨迹中的点滴小事,却是将过去与今日,记忆和现实,情感及感想,缠绕一起,余音不散,无尽的感喟,留在空白中。铅华洗却,花叶落尽,老树疏枝,清瘦而气凝,飒然而声清,是“像菜花一样的散文”的极致,留给我们长久的感喟。

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诞辰110周年。



百年思源堂: 见证大学与城市的共同发展



陈鑫

今年是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启用100周年。从天津城南的“荒凉一片”,到如今繁华热闹闹的市区,八里台的变迁不仅展现了城市空间的拓展,也是天津科教发展、城市精神塑造的缩影,是大学与城市相互赋能、共同进步的象征。思源堂作为唯一尚存的南开大学早期主建筑,亲历了百年沧桑巨变。

今天,南开师生习惯将八里台称为老校区,称津南校区为新校区。但在当年,八里台也曾是一座新校园。1919年南开大学建校时,授课于南开,南开中学南面的一栋两层楼房,直到1923年才迁至八里台。看当时的天津地图,八里台在城市南端,老城里、租界区房屋鳞次栉比,而八里台周边,除了南开大学很少有其他建筑。如今,津南校区的同学可能还会为远离市中心而抱怨,但在一百年前的交通条件下,八里台其实更加不便,何况当时还处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,身处市郊甚至安全都很难保证。1923年6月28日,南开大学在八里台举行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式,邀请社会各界观礼,以此宣告新校区启用。但由于道路不通,大部分人需要从海光寺坐船到现在的南大东门,再进入学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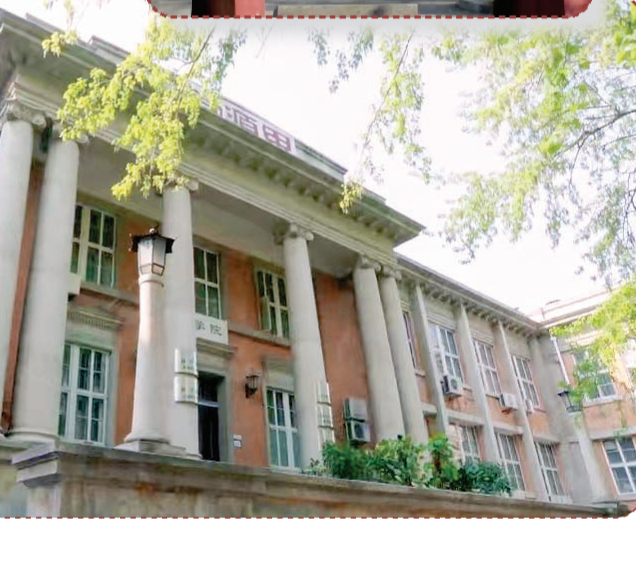
不仅校外交通不便,校内当年也到处是水洼荒地,芦苇丛生。从南开迁到八里台,南开选址首先考虑的是地租便宜,让有限的经费发挥最大效用。张伯苓校长乐观地表示,水洼可以填平,用来建设校园。后来,老舍、曹禹两位南开校友在张伯苓七十大寿时写诗道:“在天津,他把臭水坑子,变成天下闻名的学堂,他不慌,也不忙,骑驴看小说——走着瞧吧!不久,他把八里台的荒凉一片,也变成学府,带着绿柳与荷塘。”此后随着人口迁移与市政建设,在大学与城市互动发展中,八里台周边逐渐成为高等学府和文化机构聚集之区、天津的繁华地段。

当年的南开是一所私立学校,办学资源有限,全靠社会各界支持,特别是得益于来自天津的源头活水。张伯苓常常自称化缘的老和尚。南开大学早年三栋主要建筑——秀山堂、思源堂和木斋图书馆,都是在捐助下建成的,其命名也都与捐助者有关。秀山堂之名,纪念的是当时已故的江苏督军、天津人李纯。李纯号秀山,他将遗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大学。为表感谢,学校将第一座教学楼命名为秀山堂。学校最早的图书馆大楼,得名于其主要捐赠者教育家、藏书家卢靖,因其号木斋,这座建筑被命名为木斋图书馆。

思源堂的名字更是表达了饮水思源之意。建设思源堂的经费来自国内外共同资助。当时美国罗氏基金会(即洛克菲勒基金会)正准备资助中国

的科学教育,计划选择公立、私立各一所大学。经过前期调研和实地考察,基金团认为南开教学质量高、校风纯正,决定予以资助。南开建设科学馆预计需要25万元,罗氏基金团提出条件,可资助一半款项,但学校必须在国内募集到另一半经费。正在张伯苓为此犯愁时,实业家袁述之承诺,以其母袁太夫人的名义捐款7万元,解了燃眉之急。在此基础上,学校又想办法补足余款。学校将科学馆命名为“思源堂”,亦即“思袁堂”。

南开建设得到天津各界支持,学校发展反过来也为城市赢得荣光。思源堂作为南开科学馆,首先是一座理科教学楼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科师生在此进行授课、学习、试验、科研。那时中国的科学教育刚刚起步,国内尚不能培养理工科的大学教授。为此,南开专门聘请了一批刚刚从国外高校学成的学人。数学家姜立夫,物理学家饶毓泰,化学家邱宗岳、张克忠、杨石先,生物学家李继侗,等等,当年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。他们纷纷来到天津,在八里台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,后来成为国内相关学科的重量级开拓者和奠基人,很多也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院士——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和1955年新中国首批科学院学部委员。据统计,全面抗战前任南开学的学者中,成为首批院士的人数(包括文科),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五,仅次于清华、协和医学院、北大和中央大学。特别难得的是,从



在教育领域,东亚从1936年起就在天津工商学院、南开大学、北平大学、燕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辅仁大学和中国大学设立了平津贫寒学生奖学金,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寒门子弟,既是为尽社会之责,也是为储备人才,即在东亚扩展时,录用这批学生。抗战时期,为了帮助因为不和日本合作而失业、失学的燕京大学师生,宋秉卿不仅出资接济被捕的教师家属每月每人100至200元,共十多人,后来还一次性支付一年的救济费大洋

东亚公司的社会公益事业

任云兰

在每年岁暮中,东亚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。1946年,宋秉卿等人被推举为冬令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,并担任冬令宣传周宣传员,在广播电台宣讲。1948年1月10日,鉴于贫民人数增加,亟待救济,东亚与仁立公司、中天电机厂、星星纸厂、义姓造纸公司五厂筹资22500万元,在西康路沙市道口中天电机厂旁的空地上联合设立粥厂。计划实施两个月,到3月9日结束。每天施粥一次,初限定500人,后扩展到1700余人,煮粥的锅也由2口增至5口。除了施粥以外,在年关时节,东亚公司还号召本厂职工捐款数千元,在腊月二十八日,为到粥厂领粥人发放每人4万元的赈款,还很贴心地装在写有红色字体“恭祝健康”的袋子里,一天就发放了1700多份粥。

东亚社会公益事业的展开既得益于公司的成长,也为公司赢得了社会赞誉,促进了公司的发展,所以社会各界的赞誉“实业先锋”“国货之光”“富国裕民”“衣被万方”实至名归。

八里台走出的早期学生中也有三位入选——数学家陈省身、物理学家吴大猷、植物学家殷宏章。思源堂中还设有研究机构,其科研工作与天津地方产业紧密呼应。20世纪二三十年代,北方的硫酸市场完全被日货垄断。为此,有爱国实业家求助南开应用化学研究所。在所长张克忠带领下,研究人员仅用了1年时间,就设计并建成年产3万吨的利中硫酸厂。应化所又与永利碱厂展开密切合作,助力天津发展成为酸、碱、盐产业完备的中国最早的化工基地之一,打破了日货对中国市场的垄断。张克忠自豪地说:“中国问题可以由中国人自行解决。”

爱国主义是南开教育之魂。南开也因为爱国事业、爱国活动被日寇视为眼中钉。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,日本将南开这所世界闻名的教育文化机构,作为攻打天津时的首要目标之一,这在人类战争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暴行。美丽的八里台校园化为一片焦土。秀山堂、木斋图书馆、学生宿舍毁于一旦。所幸,思源堂虽成千疮百孔,但主体结构保留了下来。张伯苓得知南开遭劫,强忍悲痛对记者讲:“敌人此次轰炸南开,被毁者南开之物质,而南开之精神,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!”

思源堂现在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南开八里台校区也成了天津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“爱国奋斗,公能日新”“越难越开,愈挫愈奋”的南开精神是天津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百年思源堂,百年八里台,在新时代依然为天津发展,为科教兴国、人才强国、创新驱动发展贡献着源源不断的力量。(本专栏图片由《小楼春秋》摄制组提供)



扫二维码,观看本期节目视频。

《小楼春秋》解说词:

理科教学楼——思源堂,学校行政办公楼兼文科教学楼——秀山堂,木斋图书馆相继建成,20世纪20年代末,南开大学初具规模,马蹄湖、大中路、校钟、莲花池……校园美若花园,建筑风格独特。

南大是私立学校,它跟公立学校没法比,无论是财务、人员、资源,但是南开大学它有自己的特色,特色非常鲜明。你看最早有三科:文科、理科、商科,“文以治国、理以强国、商以富国”,办学宗旨就是“知中国、服务中国”,以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学术为背景,解决中国的问题。所以这个学校无论是办学还是育人,就是为了国家民族而去培养人才。

在育人过程中,实际上张伯苓始终贯彻着一个理念就是爱国。1934年提出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的校训,“公”是指什么,张伯苓的话是大公,实际上是今天我们所理解就是一种家国情怀,就是为民族、为国家,“能”就是你的能力,能够实现“公”志向的你的能力和水平。所以“允公允能”是我们培养学生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,也是南开精神的内核。(节选)

成绩优良者进入东亚小学读书,暑期结束后还给人发放数十斤玉米面。

东亚还致力于贫苦人的医疗救济。1943年,为救济贫苦同胞,在公司附近设立第一诊所,为贫民免费治病并免费发放药品。后又在贫民集中的谦德庄设立第二诊所,成绩斐然。每年有数千人就诊,直到1946年才结束。

因为宋秉卿笃信基督教,与教会的关系密切,所以东亚经常捐助国内各慈善团体,如救济院、慈幼院、育婴堂、慈善医院、基督教会、天主教会等。天主教系统受资助的有北平、天津以及山东济南、青岛、临清、益都等地的仁慈堂、孤儿院、医院及学校20余处,基督教系统受资助的教堂有15处,平、津、沪、渝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十余处。在友人的针织厂遇到困难时,宋秉卿接手经营,并聘请技师,教授孤儿院16岁以上孤女,使她们能生产自救,并且生产出质量上乘的产品。宋秉卿还动员东亚的客户优先订购孤儿院的产品,帮助孤儿院的孤女自食其力。

在每年的岁暮中,东亚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责任。1946年,宋秉卿等人被推举为冬令救济委员会常务委员,并担任冬令宣传周宣传员,在广播电台宣讲。1948年1月10日,鉴于贫民人数增加,亟待救济,东亚与仁立公司、中天电机厂、星星纸厂、义姓造纸公司五厂筹资22500万元,在西康路沙市道口中天电机厂旁的空地上联合设立粥厂。计划实施两个月,到3月9日结束。每天施粥一次,初限定500人,后扩展到1700余人,煮粥的锅也由2口增至5口。除了施粥以外,在年关时节,东亚公司还号召本厂职工捐款数千元,在腊月二十八日,为到粥厂领粥人发放每人4万元的赈款,还很贴心地装在写有红色字体“恭祝健康”的袋子里,一天就发放了1700多份粥。

东亚社会公益事业的展开既得益于公司的成长,也为公司赢得了社会赞誉,促进了公司的发展,所以社会各界的赞誉“实业先锋”“国货之光”“富国裕民”“衣被万方”实至名归。

